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四辑）

ChuanCheng Yu ShouWang

传承与守望

陈红彦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G256.1-53

8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四辑)

传承与守望

The Preservation of Inheritance

陈红彦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守望/陈红彦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12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吴慰慈,陈源蒸主编. 第4辑)
ISBN 978-7-5013-5695-9

I. ①传… II. ①陈…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872 号

书 名 传承与守望
著 者 陈红彦 著
责任编辑 高 爽 王炳乾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5695-9

定 价 70.00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引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序

1987年,红彦同志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同年供职于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古籍整理工作。当时古籍工作应该说是冷板凳,是很多年轻人的畏途,但红彦同志却以对专业的热爱,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我作为善本部主任,印象深刻。

红彦同志在近三十年的工作中,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再到今天“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图书馆普查目录;从点校《花间集》《全宋诗·刘克庄诗集》开始,到整整两年间,一天七小时在善本库逐一过手宋元善本史部,认真填写数据著录单,再到撰写出《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元本》;从2002年开始探讨再生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到主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普查平台研发;从个人参与部分专题研究到亲自主持一些项目的开展,一步一个脚印,逐年累积成果。这部文集便是她多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学术见证。

红彦同志2001年担任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2007年起担任刚刚开始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现在到古籍馆担任常务副馆长,主持古籍馆的日常工作。她深知作为国家图书馆古籍管理者肩上的责任,在繁忙的工作中,笔耕不辍,开展古籍收藏、古籍保护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研究能力不断增强,成为业务、管理双肩挑的卓越人才,在古籍行业中具有相当影响,是国家图书馆古籍人才的希望。

国家图书馆近年承担两大文化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实施过程中,我负责相关

业务工作,组织选目、印刷指导和提要撰写组织等工作,红彦同志始终参与其中,在《中华再造善本》及续编的选目、提要撰写中,她的古籍版本研究能力和水平上了新的台阶,不仅承担了几十篇善本提要的撰写,且质量上乘,还在提要撰写的组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古籍文献学版本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她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对项目的实施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组织国家珍贵古籍申报和专家评审,有效编制出版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开展普查平台的研发;她针对人才匮乏的现状,组织人员培训并担任授课,同时把目光投向国际上古籍保护和古籍保护教育发达的国家,探讨突破专业人才特别是高层专业人员匮乏的途径,撰写文章呼吁解决问题;她还通过组织古籍保护的实验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古籍保护科学化、规范化的新思路、新方法,组织开展的古籍保护条例、古籍工作相关标准、古籍管理制度和模式的研究,也取得初步成果,在传承文化、保护古籍理论建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红彦同志基本功扎实,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组织能力,又坐拥书城,有国家图书馆宏富的馆藏为研究提供便利,前程不可限量。我真诚地希望她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李致忠

2012年10月于国家图书馆

目 录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新 881 号《尚书》残卷校勘后记	(1)
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	(5)
国家图书馆藏元本述略	(50)
名家写版考述	(69)
《永乐大典》600 年	(82)
《玄都宝藏》与《太清风露经》	(103)
郇斋藏书与国图的深厚渊源	(105)
国家图书馆的西谛藏书	(124)
传承与守望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的部分古籍	(147)
国图:从瞬间化为永恒	(161)
为学不做媚时语,实践方能出真知	
——冀淑英先生与版本目录学	(178)
精神的魅力——追思冀淑英先生	(183)
古籍修复与人才培养	(190)
国外古籍修复人才的科学培养对我们的启示	(197)
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207)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旧方志资源利用的思考	(223)
对国家典籍博物馆职能定位的思考	(231)
主要论著目录	(244)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新 881 号 《尚书》残卷校勘后记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它记载了我国商周时期的历史,是研究我国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部史书,是我国封建史学的奠基者。同时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把它作为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的教科书而奉为经典,使之成为儒家“十三经”中受尊崇的《书经》。纷扰经学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主要就是由它和《左传》引起的。而且《尚书》这一书名也是汉代今文学家提出的。

西汉位于学官的《尚书》,是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今文本”,所教的是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和汉武帝时民间所献《太誓》,共二十九篇。西汉中期起,据传先后六次出现过先秦篆籀文体写的本子,称为《古文尚书》。最先见于记载的是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逸书”十余篇的所谓孔子家传本(见《史记·儒林传》)。其后盛传的是刘歆所说,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简称孔壁本,它比《今文尚书》多“逸书十六篇”。但在汉代流传的所谓《古文尚书》实际只有东汉杜林本,其中也没有逸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的二十九篇。东汉几位古文家作注也就是这二十九篇。但刘向、桓谭、郑玄却说古文篇目有五十八篇。至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便包含了西汉今文二十八篇析成为三十三篇,及从各种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的二十五篇。终于凑成了刘向等人所说的五十八篇,在经文下标为“孔氏传”的注,并在全书前有一篇《孔安国序》。由于它积聚了八百年来人们引用的《尚书》文句和四百年

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而且每句都有解释,为人们乐于接受,被看成是汉代孔安国所传真古文,获立于学官。这部晋人编造出来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便取得《书经》的正统地位,一直传了下来,现在我们见到的敦煌北新 881 号的《尚书》也正是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研究的艰难除今古文之争的原因外,字体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书法的进化自不必说,转抄、错认导致的错误,古代文字本身不规范,同音假借等也有不少,更有经学家们故意篡改、作伪等。至晋代则创造出一种假古董字体,叫作“隶古定”,是用正楷按蝌蚪古文的笔画写定的字体,看上去非常怪异,这种字体从晋到唐天宝前一直使用着。由于其难认难写的特点,唐天宝间,才令集贤学士卫包将其改为今字,并于开成年间(836—840)刻成石经,今字本才取代了隶古定本。

由于卫包改字是在天宝三年(744),所以此前的写本常被定为隶古定本。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藏的这件《尚书》残卷,写于唐初高宗朝,便被《味青斋敦煌秘籍佚卷存目》著录为“唐隶古定尚书尧典残卷”。但实际上,这件《尚书》并非“隶古定尚书”。

藏于北图善本部的这件编号为新 881 的《尚书》残卷,总长度为 367.2 厘米,单幅纸长 42.7 厘米,宽 28.2 厘米,161 行,行 17 字左右不等,共 10 纸,纸质为薄麻纸,色褐黄,质焦脆。文献内容为《尧典》的后半部及《舜典》的全部,经传合抄,经文大字单行,孔传小字双行。《尧典》卷首上下端残,经文自“黎民于变时邕”的“邕”字始,传文自“九族既睦”的“九族”始。《舜典》首题“舜典第二 虞书 孔氏传”,尾题“尚书卷第一”。全卷遇“世”“民”皆行避讳,或缺末笔,或改“民”为“人”,避唐太宗讳。遇“治”则改为“理”,或仍作“治”,避高宗讳,不很严格。据此可推断,此文献出于唐高宗时期。

所谓“隶古定”,颜师古在《匡谬正俗》卷二中有这样一段解释:“按直云隶古即是隶古字,于理可知无所阙少,定者,为定讫耳。今先代旧本,皆为隶古定,不为古字也。”这个解释有这样几层含义:一、隶

古字是用隶书按古字笔画写的,不是把古字改成隶书,古字的笔画不能缺少;二、“定”是最终写定之意;三、先代旧本的字体不是用当时的古字,而是用隶古字写定的。孔安国的《尚书序》是后人伪作,因此他的话不能用来证明隶古定本始于西汉,也不能用来说明“隶古定”的“隶”为隶书。隶古定的“隶”为正楷,因由隶书转变而来,故魏晋沿称为隶书。从这个意义上讲“隶古定”应是用正楷按蝌蚪古文笔画写定的字体(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前言》)。因此隶古定在外形上与正楷有很显著的差别,如正书的“會”,隶古定写作“𠄎”“𠄎”。正书“辟”隶古定写作“𠄎”,正书“天”隶古定写作“𠄎”等。由于难写难认,隶古定常被人称为奇字,所以隶古定《尚书》出现不久,便有东晋范宁将其改为用今字书写的《尚书》,并做了集注。在《隋书·经籍志》中便有《今字尚书》十四卷的记载。这说明唐以前曾有过今字《尚书》的通行。但这种今字《尚书》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未见记载,很可能当时今字本未能广泛流传便已亡佚。正如阮元在《校勘记序》中所言:“天宝三载,诏集贤殿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说者谓今文从此始,古文从此绝。殊不知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之后,又别有古文也……”

不可否认,隋唐前从总体上讲,隶古定《尚书》是占主要地位的,即使卫包改字之后,民间传抄本仍有很多是隶古定本。其原因,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的一段话分析得很精彩:“六朝至唐,由隶变楷,在书法进化上为自然趋势,特以此经独有古文之名,学者狙于师承,递相传写,故字体之变化独缓。然在楷变时期,墨守者其经本变化少,聪明者其经本变化多。卫包以前,必非昔时经本之旧矣。然则卫包改字,正所谓‘下令于流水之源’,则士子遵行,风行海内……不百年而古文几绝矣。”也就是说,在卫包改字之前即有今字本《尚书》出现是肯定的。而北图藏这件《尚书》即当是这一时期的今字《尚书》。

笔者以北新881为底本,以中华书局1980年的《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简称“传世本”)为校本,做了通校,发现北新881与传世本主要差别在于:

一、敦煌俗字与正体字的差别

敦煌卷子为手写，其书写习惯与现在差异较大，在当时是约定俗成，带有明显的地域及时代特征，现代人称之为俗字。如传世本中的“漫”“貌”“朔”“暨”等，敦煌本作“漫”“貌”“朔”“暨”等，这些均不属于隶古字。

二、脱文、衍文

在敦煌卷子中较常见，或许抄写者所用底本不同，或许抄手一时疏忽，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如“平在朔易”，新 881 就作“平去在朔易”，衍一“去”字。孔传“以正冬之三节”，新 881 脱一“以”字。孔传“考齐七政”，新 881 作“考七政”，脱“齐”字。

三、“也”字的使用

敦煌本“也”字使用过多，或与当地语言习惯有关，多数对上下文义没有什么影响。

四、避讳字

敦煌本避唐太宗讳“世”“民”较严格，或缺笔，或改字，如将“民”改作“人”，避高宗讳不很严格，或改“治”为“理”，或仍作“治”。

五、通假字

如传世本“雍”敦煌本作“邕”，传世本“辟”，敦煌本作“避”。古“雍”与“邕”通，“辟”与“避”通。

不可否认，北图藏这件《尚书》中，仍有一些字看上去很怪异，很可能是未及楷变的隶古字，但从数量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对这件《尚书》定为今字《尚书》的结果不构成影响。这件初唐时期今字《尚书》的出现，希望能给《古文尚书》文字演变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原载于《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 年第 4 期

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

1900年,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敦煌,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得藏经洞进入了世界学术的视野。

敦煌遗书的流散,一直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年,王道士以及押运人到底使多少敦煌遗书散落民间,又有多少被破坏直至毁灭,研究者一直欲探究竟,但至今没有明确答案。这造成的遗憾是,至今我们仍无法统计藏经洞到底有多少件敦煌遗书,这对探究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对整个敦煌学史的研究都是很大的制约。

现在我们从已出版的各家敦煌图录中辑录出相关的收藏印、鉴赏印以及与流散有关的信息,将其集中,并按照印主姓氏音序排列。对印主之生平及收藏或鉴赏过程略加叙述,且将印鉴与藏品编号相对应。希望这项工作的成果能为敦煌遗书的追踪提供一些线索,使敦煌遗书流散研究能有更大的推进。

综观我们已知的敦煌遗书的收藏者,其身份更多的是书画家、收藏家、旧官吏,特别是当时曾经在甘肃地区以及敦煌遗书解京途中各地的官吏。这些藏家从不同角度去审视敦煌,领略敦煌带给我们的深刻内涵,吸纳敦煌的无穷魅力;但真正研究敦煌、研究敦煌遗书本身内容的藏家却凤毛麟角。不过正是如此,也说明了敦煌永远无法挖掘穷尽的价值,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所在。

为节约篇幅,文中收藏单位名称使用简称,故首列机构名对应表。

* 本文与林世田合写。

其中部分印章因学识和掌握的材料有限,尚无法确定印主,希望随着调查的更加全面与深入,敦煌遗书的流散会显现出更加清晰的脉络,对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有良好的促进。

简称	全称	简称	全称
BD	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保所	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故宫	故宫博物院	北大	北京大学图书馆
天津文物	天津文物公司	西北师大	西北师范大学
津艺	天津艺术博物馆	国博	国家博物馆
南图	南京图书馆	浙博	浙江博物馆
敦研	敦煌研究院	北三井	日本三井文库中北三井
上博	上海博物馆	上图	上海图书馆
甘博	甘肃省博物馆	敦博	敦煌博物馆
甘图	甘肃省图书馆	定博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
永博	甘肃永登县博物馆	天理大学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招提	日本京都招提寺	大东急	日本大东急纪念文库
东大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台北	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日国会	日本国会图书馆	藤井	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大谷大学	大谷大学图书馆	傅斯年图书馆	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

陈三立(1856—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修水人。陈宝箴子,陈师曾、陈寅恪父。为晚近著名诗人。工书。

陈印三立 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 2005 年秋季拍卖会第 2262 号拍卖品

陈锡钧(1880—1961),字伯衡,江苏淮阴人,迁杭州。西泠印社成员。精碑版学,收藏甚富。最善书曹全碑,沉着稳秀。1965 年子女将其收藏捐赠浙江省博物馆。

伯衡 上图 006

陈锡钧印 浙博 039

陈伯衡 浙博 039

陈闾(1882—?),字季侃,浙江诸暨人,清举人,民政部郎中。1917年任甘肃兰山道尹,1920年12月暂护甘肃省省长,一年后去职。在任期间购求敦煌遗书三四百卷。1925年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陈闾 BD14528 BD14560 BD14953 上图 078 上图 079 灵隐寺 01
浙博 168

陈闾之印 BD14528 BD14544 上图 077 故宫新 184190

闾 BD14560 BD15125 上博 04

陈闾度陇所得 BD14560 上图 079 上博 23

陈闾偶得 BD14953 上图 079 上博 02 浙博 168

陈闾晚福 BD14953

古越陈闾 BD14996

陈闾墨守 BD14996

宝室室主 BD14560 上图 079 上博 23

禅晋辑善之室 BD14953 上图 078

字曰季侃 BD14996

公亮长寿 BD14996

藏有晋隋唐人写经 BD14996

公亮 上图 080

公亮眼福 上图 079

季侃 上图 078

侃叟作 上图 078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清光绪进士,历任顺天府尹、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亡前夕,陈夔龙以病告假,退隐上海。

庸庵 文保所 02

陈撷宁(1880—1969),道号圆顿子,安徽怀宁县人。清末秀才。自幼受家庭私塾教育,儒学根基深厚。年十五因病改学中医,并慕出

家人清修法,因萌“学仙”之志。1905 年入安徽高等政法学堂,未几因病退学,遂遍游名山,寻师访友,开始步入“仙学养生”领域。民国初寄居上海。1960 年后任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著《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道藏书目分类》,主编《道教知识汇编》《中国道教史提纲》等。

陈撄宁 上图 006

陈泽秦(1914—2006),字少默,斋号啻盒。安康人,世居西安。父为陕西末任督军陈树蕃。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文系,以诗文、书法及古典书画、古籍善本和文物鉴定闻名于世。

啻盒情缘 上图 094

陈曾寿(1877—1949),字仁先,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巴河陈家大岭人。因家藏元代吴镇所画《苍虬图》,因以名阁,自称苍虬居士。少有文名,博览经史子集,旁及古文诗词。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历任学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广东道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拒绝袁世凯让他出任提学使之请,寓居杭州西湖,吟诗作画,谈经论道,参禅拜佛。后宦囊告罄,不得不出卖家藏的名人字画以求糊口。1930 年,在友人陈宝琛再三敦请下赴津,为婉容进讲。后迁居北京、上海。有《苍虬阁诗集》十卷及续集两卷、《旧月移词》一卷。其词风独到,清末民初,与江西陈三立、福建陈衍并称“海内三陈”。

陈曾寿 上博 05

陈曾佑,字苏生,以字行,湖北蕲水人,光绪己丑(18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甘肃学政、提学使。1910 年在兰州筹办图书馆,于 1916 年 5 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即今甘肃省图书馆的前身。

陈曾佑印 BD15294 BD15295 上博 58

曾佑 BD15123 BD15294

苏生 BD15296

苏 BD15293 BD15294 BD15295 BD15296

陈柱(1889 或 1890—1944),原名郁瑞,字柱尊,少时名绳孔。广西北流萝村人。室名守玄阁(妻名杨静玄)、注叠庐、十万卷楼、变风变雅楼。1912 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堂附属中学,后肄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先后执教于上海交大预科、上海交大、大夏大学、暨南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安徽大学、中央大学等,为南社、中华学艺社、新中国建设学会、中国学术讨论社成员。

陈柱审定 上博 75

陈柱字柱尊广西北流人也少时名绳孔 上博 75

好为诗及骈散文亦喜收藏金石书画 上博 75

尘空(1908—1979),俗姓王,名宗禹,湖北省荆门县(今荆门市)拾桥镇人。1918 年在当阳玉泉寺出家,1929 年入武昌佛学院研究部受学,后长期跟随太虚大师,1935 年,奉太虚大师之命协助法尊法师处理汉藏教理院院务,1937 年参加重庆的僧侣救护队,1939 年曾主持《海潮音》杂志的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曾住持西湖灵隐寺、上天竺寺。法师著述颇多,出版问世者有《普陀山小志》《灵隐寺志》等,论文散见于《海潮音》杂志。

尘空 上图 006

湛延年,天津人,教授。2002 年 12 月其珍藏的两卷敦煌写经在博古斋和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古籍善本、中国书画第二专场拍卖会上拍卖。

湛延年得敦煌石室宝藏 津艺 065 津艺 177

湛延年得敦煌石室秘宝 故宫新 154423

沾上湛氏墨缘室珍藏 故宫新 154423 津艺 065

邓隆(1884—1938),字德舆,号玉堂,又号睫巢居士。甘肃临夏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解元,三十年进士。曾任南充知县,代理顺庆府知府。宣统三年(1911)母丧归家,筑拙园于兰州居之。民国元年,为甘肃省议会议员。晚年潜心于佛学,参与省志修纂。著有《拙园文存》《密藏问津录》《番佛名义》《文字般若集》等。

邓隆 甘博 059

丁士源(1879—1945),字问槎,一字文槎,号藹翁,浙江吴兴人。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后留学英国,回国后任陆军部军法司司长、高等巡警学堂总办等职,段祺瑞政府时期为陆军少将参议,后升陆军协都统、副都统。1914年后历任北洋政府江汉关监督兼外交特派员,京绥、京汉铁路局长,天津《日日新闻》主笔,国内公债局总理,天津中华汇业银行经理。1932年后,曾任伪满驻日公使、驻国联代表。善画,喜收藏。著有《世界海军现状》《陆军规则注解》等。

藹庵士源 BD15101 BD15102

陆军军法协都统印 BD15101 BD15102

藹庵珍藏 BD15101 BD15102

十七松斋 BD15101 BD15102

庚申第六人 BD15101 BD15102

董士恩,曾任滨江道伊东省特别市政管理局局长、财政部次长,1924年授陆军少将。

董士恩印 津艺 242

窦景桂,字萃五,甘肃敦煌人。窦景桂及弟窦景椿先生是民国初敦煌名士,收藏敦煌文献颇多,有书斋名潜心斋。新中国成立前窦景椿将其中一部分带至台湾。窦景椿曾为于右任的随员,1943年3月受聘于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并协助常书鸿到敦煌开展建所工作。

窦氏潜心斋珍藏 敦博 041

段永恩,字季承,甘肃武威人。在新疆为官多年,民国初年曾担任孚远县(今吉木萨尔)知事,还担任过《新疆图志》的分纂。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8册吐鲁番出土写本残片,其中多有段永恩的跋文。

季 永博附 005 永博附 006

承 永博附 005 永博附 006